彭州铜矿资源与古蜀青铜文化

张学君 张缪斯

在对古蜀青铜器的研究中，有学者对比同期中原、江淮出土的青铜器，得出了配方差异很大的结论。（参见曾中懋：《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铜器成分的分析》，《四川文物》1989年，《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由此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三星堆、金沙的青铜器与中原和江淮地区早期青铜器配方为何不一样？笔者首先要澄清的，是“配方”一词。所谓“配方”，是后人对古代铜器成分化验的结果，并非先民预先设定的原料比例。地质矿物学告诉我们，铜矿石绝大多数是金属、非金属共生体，含金属、非金属成分不同，共生比例也不一样，冶炼结果自然有了差异。因此，古蜀、中原和江淮地区青铜器成分的差异，主要是因为铜矿资源的差异，由于各地铜矿石中共生金属和非金属成分的不同，而导至青铜器具有不同成分的冶铸结果。

有学者认为，巴蜀青铜器锡含量低的原因是为了降低成本。这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并不适用于上古先民；因为他们尚未具备这样的经济头脑。要说省工省事，最便捷的办法莫过于就

说是他的寄情之作。

范晔对班固及其《汉书》十分推崇，这在他的《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是多处言及的。《汉书》记载的王昭君事迹，本已比较完整客观。南朝史学家研究西汉的人和事，不能不以《汉书》来做史料依据，史料有误，当可辨正。范晔论证其他史实，也都是这么办的，唯独描写王昭君和亲事，却反其道而为之，去向当时的文学作品寻找启示。问题就出在这里。

范晔撰《后汉书》时，描写王昭君的诗文，如《西京杂记》、《琴操》、《明君辞》等均已传论于世。昭君命运的文学形象，恰与范晔个人遭遇不谋而合。像《西京杂记》作者葛洪等人都借昭君这个酒杯，浇个人块垒，范晔对此岂能无动于衷？

王昭君虽入选掖庭，但汉宫封建等级森严，到汉元帝时，皇后以下计为十四品等，王昭君乃是十四等级之下的一般宫女，根本不具备争宠条件，她怎么可能产生“见御”的奢望呢！很显然，“不得见御，积悲怨”正是范晔怀才不遇的借题发挥。当时，民族大融合的形势方兴未兴，北方各民族政权并不拒绝南朝宋人前去效力，范晔既然不被南朝宋帝器重，何不求行北去，另觅天地呢？“乃请掖庭令求行”不正是范晔心向往之的假托么？

《汉书》作者班固及其父班彪本是东汉初人，班彪的外祖父金敞就是匈奴人金日磾孙，班氏父子比较有条件了解匈奴事。而范晔撰《后汉书》时，《汉书》已问世三百余年。范晔如果像对待其他史实一样，认真查阅《汉书》，核对虚实，就不会出现如“自请出塞”、“临辞盛会”、“意欲留之”等等失真之笔，也就不会给后人留下如许质疑的问题，以致让王昭君几乎失了真。

对于同一历史事件，若史料相互矛盾，则应坚持“最先最近者最为可信”的原则加以鉴别，所以范晔《后汉书》对昭君的诠释，除经旁证无误的史料外，其他仅能如轶闻一样，仅供治史者参考而已。

注释：

[1]祁和晖：《王昭君名氏异说》，《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6期。

[2]《汉书》卷九《元帝纪》。

[3][4]《南史》卷三十三《范泰列传附范晔传》。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

地取材，于是这里又引出一个新问题：三星堆、金沙古蜀文化遗址都发现了数量巨大的青铜器，它所需要的铜矿石数以千吨计，这些铜矿石从何而来？是产自古蜀地区，还是来自铜矿资源更为丰富的滇文化区？

一般来说，古代金属冶铸工场的最终选择应是在矿藏资源附近，不可能将金属含量仅3%左右的铜矿石运送到数百、上千里以外去冶炼。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简报证实，青铜器的铸造工场地就在遗址上。（参见《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成都金沙青铜器发掘现场除发现1500余件青铜器外，还发现数量众多的大型青铜器残件。（参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第17页，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出版）这说明冶铸工场也就在遗址现场。原本可以由此推测，铜矿资源应当就在古蜀文化圈内；但是迄今为止，因为缺少直接有力的证据，学者们难以作出确切的回答。

20世纪90年代初期，权威部门关于古蜀青铜器铸造原料来自滇文化区的鉴定结论，使这个问题进一步陷入谜团。据中国科学院王树英先生介绍，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曾对三星堆青铜器取样分析，认为其冶炼铜料可能来自云南地区。（参见谭德睿、王树英在1992年10月在安徽铜陵“首届中国青铜文化暨亚洲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根据笔记整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难以服人。

四川与云南之间的民族迁徙和文化影响固然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经济上的交流至少可以达到秦汉时期。近年来成为热门话题的“西南丝绸之路”，许多学者对此作了不少开拓性的研究；但这与云南铜矿石大规模源源不断运输四川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在缺乏道路交通和运输设施的条件下，由行旅尚难逾越的云贵“鸟道”，跋涉数千里，跨越横断山脉，从云南铜矿产地将数以千吨计的铜矿石持续不断地运到成都平原冶炼，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天方夜谭；除非传说中的神通广大、具有移山填海功夫的大力士才能做到。

不少矿业史研究论著证实，上古矿冶业受到交通运输条件限制，大多采取就地取材的办法，在自己部族活动的范围搜求冶炼原料，就地设炉冶铸，才能持续保持规模较大的青铜器冶铸活动。古蜀青铜冶铸业的存在也不能例外，矿藏资源与冶铸场所不应相距遥远。可以肯定地说，在三星堆、金沙古蜀文化区域内应有足资利用的铜矿资源。我们可以从矿产地质、历史资料中搜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首先可以从矿产地质科学的角度来了解，古蜀青铜冶铸场所附近有无铜矿资源。根据四川地质部门的勘探调查，四川铜矿资源名列全国第十位，保有储量203万吨。四川铜矿资源主要分布在盆周西南的今甘孜州和凉山州的一些偏远地区，当时尚不在古蜀势力范围，加之交通不便，并无开采利用的可能性。

因此，应在古蜀文化圈内寻找可能的铜矿资源。经笔者考察，这个范围的确有铜矿资源，分布在如下地区：今成都市所属的彭州市，乐山市所属的洪雅、峨眉县，雅安市所属的荥经县，绵阳市所属的青川县。若依就近冶铸、交通方便而论，彭州市紧邻广汉、成都，境内铜矿资源距离三星堆、金沙冶铸工场都不过数十公里，一马平川，具有就地取材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彭州又是一个富饶的铜矿产区。四川第一支铜矿地质队，就是西南地质调查所于1951年6月组建的彭县（今彭州市）铜矿勘探队，1953年改名为西南地质局211队。经过近两年的调查、勘探，这个地质队提交了勘探工作报告，估算铜储量1.5万吨。1954～1956年，冶金304队接替211队勘探工作，重点勘探彭县马松岭矿区，探明铜储量1.87万吨。1975年，冶金601、606队继续对彭县大宝山、铜厂坡、铜厂湾、马松岭等矿区进行勘探，



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的三星堆遗址二号坑

探明储量2.06万吨。(参见《四川省志·地质志》第216~217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一储量丰富、又近在咫尺的铜矿资源,正好处于蜀文化核心范围,先民岂能舍近求远?

历史上,关于彭县铜矿几乎没有记载,可能古蜀冶铸业衰微以后,彭县铜矿资源废弃千余年,不再为人所知。秦代因迁徙、安置移民的原故,蜀地冶铸产业转移到临邛、洪雅一线。因此秦汉时期蜀地铜矿,只知有汉文帝赐予邓通的"蜀严道铜山",不知有彭县古铜矿。但在前人关于彭县山水记载中也偶有端倪,如唐人高适为彭州刺史时,《彭州山行》诗有"峭壁连崆峒,攒峰迭翠微"之句。崆峒是什么?古矿硐遗址也。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之五"彭县"引《寰宇记》:"(五龙)山高数百丈,延袤二十余里。山麓有峒,……悬崖中有斧凿痕如井,深数十百丈……复入第三、四、五、六峒,峒下重渊,深不可测。"(曹学佺著、刘知渐点校《蜀中名胜记》第71~73页,重庆出版社,1984年出版)由于大量矿峒的存在又无历史资料证明其来源,所以为后人留下各种神仙洞府的传说。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半个世纪的考古发掘终于为我们揭开了彭州铜矿资源与古蜀青铜文化的密切关系。新繁水观音墓葬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彭县竹瓦街殷商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与三星堆、金沙出土的青铜器一样,都应是彭州铜矿资源造就的古蜀青铜文化的组成部分。没有彭州铜矿资源,就不会有古蜀灿烂的青铜文化。

经过科学工作者对彭州铜矿的实地调查,远古矿冶遗迹开始重见天日。1938年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下《四川彭县铜矿》记载:

> 彭县铜矿在县城西北百余里之大宝山,距灌县百二十里,距什邡百五十里,交通尚称便利。大宝山有废矿穴、炼铜炉之遗迹甚多,相传宋徽宗时,曾就此山冶铜铸钱,故今日在山麓每掘得崇宁年号之古钱云。(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第676页,商务印书馆,民国27年3月初版)。

另一调查报告是1938年张肖梅主编《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记述更为详尽:

> 本山矿区内,花梯、飞水岩、马松岭、半截河等处,均曾凿峒采取矿砂。……平山铜矿之发现,其年代已不可考;惟据一般之传述:谓花梯、马松岭各处,颇多古峒遗迹;而于距大宝山数十里之朱家山,曾发现宋徽宗时崇宁年号古钱甚多,其时就山铸币,此又一证也。烟熏岩之天宝峒,亦遗有燕子岩炉房废址。由此推测,足征宋元以来,曾经就山开采,设炉冶炼以供铸造铜币之用,毫无疑义。(张肖梅主编《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17章第23页)

上述两个考察报告证实,彭县大宝山一带铜矿确曾在古代得到大规模开采,废矿穴、炼铜炉"遗迹甚多",各矿区"均曾凿峒采取矿砂",花梯、马松岭各处"颇多古峒遗迹"。"其年代已不可考"。因在朱家山掘得大量崇宁古钱,便确定是宋徽宗时曾经在此冶铜铸钱,进而认定宋元以来曾经就山采铜冶炼、铸造铜币。

彭县铜矿如此大规模的采矿遗迹,竟然不见于历史记载。更为有趣的是,西汉初南安人邓通受到文帝宠爱,被赐予"蜀严道铜山",后世史志附会的"严道铜山"可以说是多如牛毛,遍布全川,唯独没有彭县铜矿。(参见张善熙:《邓通铸钱地问题探讨》,《文史杂志》1995年第3期)这只能说明,彭县铜矿是史前遗址,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湮没日久,后人不再知晓,因此从秦汉以来的人们视野中消失。但我们绝不能因为偶然发现大量崇宁古钱,就断定它是宋元以来的铜矿遗址。当然,要证实它是否是古蜀曾经开采利用的铜矿,以及是否是三星堆、金沙青铜冶铸业的铜矿石供应基地,还需要充分的考古发掘资料来加以证实。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四川开办新式工业,采矿业成为基础工业,勘探矿产资源、开办五金矿产各业成为兴办实业的新趋势,彭州铜矿资源重新焕发青春。光绪三年(1876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开办新式军火工业——四川机器局,所用大量铜、铅、钢、铁,即来自彭县等地。刘秉璋接任后,一如既往,"需用铜、铅、钢、铁,……请仍照前案,在成绵道土货厘金项下提拨银两,饬令委员在于省城"就近地方采买上色精铜壹万捌千斤,净铅壹万玖千斤,苏土钢壹千斤,毛条铁陆千斤。"(《谕折汇存》,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初七日,页10。转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495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在省城就近地方采买如此数量的精铜及其它原料,非彭州铜矿莫属。由于军火原料需求的日益增加,使铜料供应不足。光绪二十八

杨正苞



唐太宗是伪君子吗

本年2月6日的《文摘周报·文史版》转载了史式先生发表在贵州《文史天地》题为《伪君子唐太宗》一文，读后，觉其立论及论据值得商榷。史文的论据有三：一是说“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为了夺位，杀了兄太子建成、弟齐王元吉。二是说太宗的纳谏和魏徵的犯颜直谏，“常常是他们在唱双簧”，是“做秀”。三是说太宗“诈取”《兰亭序》帖。

关于“玄武门之变”，管见以为应当联系以下三情况加以考察：1.唐朝的建立和统一，李世民出力最多、功劳最大。（周谷城《中国通史》也称：“李渊受禅，仗着次子世民的本领，不出十年将一个群雄割据四分五裂的大帝国完全统一。”）从情理和形势上看，世民自当接李渊位。2.事变前，元吉结帮建成有剪除世民意。3.唐的建立与统一，秦王府的将士谋士出力最多、功劳最大，他们必须把秦王推上皇位才能得到应得的封赏，而秦王也不敢失去他们的支持。这样来看“变”的发生实属“事”之必然，不是世民除去建成、元吉，就是建成、元吉除去世民。故而事发后李渊也只好妥协了事。

关于太宗君臣“演双簧”、“做秀”之说，未见于《唐书》及《通鉴》，就“某次罢朝太宗回到内苑后大发雷霆说：‘魏徵每廷辱我……会须杀此田舍翁’，经皇后苦劝姑息怒”一节看，魏徵确实不只一次犯颜直谏，甚至惹恼太宗动了杀机；但他没有在朝上就斥责或杀了魏徵，想杀也还要等魏徵铸成可杀的大错。看来直谏与纳谏似非君臣“做秀”，事情最后还是以听劝结束。此次进言者虽是皇后，但仍显出太宗纳谏的美德。君明臣良在帝王专制统治时代是十分难得和可贵的，太宗纳谏和魏徵直谏的良好历史形象须给予应有和必要的尊崇。

关于“诈取”《兰亭序》帖自然不是一件光彩之事，但也应考虑以下三个情况：1.太宗所渴求的是文化艺术珍品，毕竟不是金银珠宝，其初始的愿望并不涉恶。2.辨才召至京，否认藏有此帖，太宗未采暴力强取。3.诈取之计出于臣僚的阿上，而非太宗亲授。《序》帖最终露面，太宗也未以辨才曾“欺君”而治其罪。

总的说来李世民不是完人，自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失；但比起他的“统一全国”、开“贞观之治”和启“大唐气象”的历史伟绩，则不当过于苛求吧？

唐代，以日本、新罗诸国派人到唐留学为表征的文化发达；以西域诸国来唐通商盛况为表征的产业发达；以周边诸部族的臣服或友好为表征的军事发达及其综合影响所形成的“大唐气象”，在我国历史上乃是十分可贵、值得我们今天仍然向往的文明时代。我国历史的长河多属狂涛汹涌的“乱世”，波平浪缓的“治世”则较少，尤其是能推行有利于民的均田制、租庸调法，加强地方官吏的考核，任贤纳谏和发展科举制度等良好措施的唐朝初盛期更是难得。让我们以自信和崇敬的心态维护好我国历史上曾有过的文明灿烂之页，谱写好这些文明之页上的卓越人物的光辉形象吧！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年（1902年），商人魏子书呈请川督锡良，自愿报效，自备资金，经营彭县大宝山铜矿。开采一年余，锡良责魏办理不善，收归官办。宣统元年（1909年），川督赵尔巽决定改良冶炼方法，任命日本矿科毕业生孙海寰参用西法冶铜，铜厂初具规模。民国4年（1915年），彭县铜矿改属铜矿公司经营，年产200余吨。彭县铜矿再次焕发出它的青春。

作者单位 张学君：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都）
张缪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